

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

杨穗 李实

【摘要】文章利用 1995、2002、2007~2009 年和 2013 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城镇住户数据, 实证分析了过去 20 年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变化。结果表明, 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水平整体上表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 在 2007~2009 年有短暂的回升, 但总体下降的趋势不变。1993~2013 年, 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变化主要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 而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一直持续存在。在经济转型背景下, 劳动力就业特征随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不同时期对家庭收入流动产生不同影响, 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收入流动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因此, 提供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 强化再分配功能是促进收入流动、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收入流动 收入差距 经济转型

【作者】杨穗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一、引言

收入流动性是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一项重要的内容, 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社会收入差距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时间长短的选择。短期收入差距与长期收入差距的不同主要取决于收入流动性。在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 如果收入流动性很高, 低收入者通过努力就有机会成为高收入者, 那么长期的收入分布会变得平等 (Krugman, 1992)。国外已有大量关于收入流动的文献, 如 Shorrocks (1978a) 研究收入流动如何降低不平等, Fields (2010) 提出流动性作为长期收入均等器的概念。收入流动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收入变动、机会平等, 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指标 (Friedman, 1962; Atkinson 等, 1991)。

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变动与宏观经济的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演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城乡就业人员收入流动性比较研究”(编号: 15AJY006) 的阶段性成果。

变密切相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展开不仅带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力流动开始加强,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来源逐步多样化。2000 年前后,国有企业改革造成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城市贫困问题凸显,在内需不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整体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放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3 年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出口增长的同时国内投资旺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收入分配改革从 2004 年开始启动调研,“提低、扩中、调高”一直是政策调整的主线。2007 年以来,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和扩展,如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调整,极大地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但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的过快增长,仍然阻碍着收入差距的缩小。2011 年以来,受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出口不振,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不同行业的经济效益出现分化,行业收入差距日益扩大。2013 年,历时 8 年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明确提出促进中低收入职工工资合理增长、加强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等意见。

随着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日益严峻,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问题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测度流动性水平,二是探究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从流动性水平来看,由于采用的数据、收入的定义和分析方法的不同,研究结果存在一些差别。利用 1995 和 2002 年 CHIP 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和居民个人收入的流动性 2000 年左右比 20 世纪 90 年代初均有了明显的下降,在缩小长期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越来越小(Khor 等,2006、2010;尹恒等,2006;罗楚亮,2009)。而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如王朝明、胡棋智(2008)根据 1989~2006 年 CHNS 数据发现城市家庭收入 1991~1997 年缺乏流动,2000~2004 年流动性较高。同样利用 CHNS 数据,周兴、王芳(2010)的研究却显示,城市家庭收入流动性 1997~2000 年达到最高,2000~2004 年开始大幅下降。在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多数研究集中在农村地区,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家庭规模、人口结构、劳动力转移等对收入流动有明显影响(孙文凯等,2007;章奇等,2007;Shi 等,2010;严斌剑等,2014;杨穗,2016)。王洪亮等(2012)则从全国层面分析,表明收入结构、家庭特征、工作状态、职业特征和地理位置影响显著。臧微、白雪梅(2015)进一步考虑了家庭支出结构对收入流动的影响。

现有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文献主要考察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收入流动性问题,而较少涉及 2010 年之后的变化情况。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及中国政府采取的应急对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发生了影响,也对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产生了影响。从此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常态,工资结构和工资差距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出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那么,在此期间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与前期相比具有什么特点?出现了哪些不同的影响因素?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数据说明及描述统计

(一) 样本说明

本文采用的微观数据来自1995、2002、2007~2009年和2013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城镇住户数据,采用的收入定义为家庭人均收入。

1995年CHIP城镇数据包括住户成员在1995年的个人收入总计,以及1990~1994年个人全年收入的回忆信息。本文在个人收入水平上加总得到各年的家庭总收入,并根据1995年的家庭调查人口数,计算得出城镇家庭各年的人均总收入。由于调查中没有回忆年份的家庭人口数,因此本文假定家庭人口数不变,这一假定忽视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收入变动的的影响,可能会造成对这一时期收入流动性的低估。2002年CHIP调查数据报告的收入为家庭成员2002年个人全年现期收入,同时报告了1998~2001年的个人全年总收入。同样假定人口数不变,利用2002年的家庭人口数计算相应年份的家庭人均总收入。2007~2009年CHIP城镇调查得到的是连续3年的家庭追踪数据,收入信息为全年家庭总收入,包括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本文直接根据各年调查的家庭人口数计算得到当年的家庭人均总收入。2013年CHIP城镇调查询问了住户2011~2013年的可支配收入总额,本文根据2013年调查的家庭人口数计算得到各年家庭人均收入。

为了保证时间跨度的一致,本文选取1993~1995年、2000~2002年、2007~2009年、2011~2013年4个分析阶段。有效样本限定为分析时期内收入信息和研究所需其他关键变

1995年的个人收入包括职工工资、职工从单位得到的其他收入、私营企业主的税前净收益、个体经营者的税前净收益、个体被雇者收入、离退休再就业人员收入、其他就业者收入、其他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家庭副业生产收入。

2002年CHIP城镇数据收入信息的另一个来源是国家统计局的家庭调查数据,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部分数据缺乏过去的回忆信息,为了保持收入报告口径尽可能一致,本文只采用CHIP问卷调查得到的个人收入。根据两个来源计算得到的2002年城镇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分布非常接近,CHIP独立调查部分得到的均值为7870.33元(标准差为5258.27),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的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均值为7893.18元(标准差为5125.59)。

本文所涉及的2007~2009年CHIP城镇数据即为2008~2010年中国乡城移民调查(RUMiC)城镇数据,CHIP以调查数据所在年份命名,RUMiC以实际调查年份命名,为了与1995、2002和2013年的数据介绍保持一致,本文都称为CHIP。实际上2007年CHIP城镇数据还包括了RUMiC调查不包含的另外10000户城镇家庭,这部分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由于只是1年的截面信息,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

2013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城乡一体化的住户收支调查,采用的是可支配收入。由于1995和2002年的回忆数据是总收入,没有回忆税收和社会保障支出信息,同时2007~2009年CHIP调查部分只有家庭总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缺乏税收信息,因此本文无法计算这三轮数据的可支配收入。

量全部完整的样本,4个阶段样本量分别为6780户、6795户、3008户和6150户。本文对CHIP数据的全部样本与构建的有效分析样本之间进行了简单的比较,包括收入特征、家庭结构特征和户主特征等。整体上,本文的分析样本仍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 收入水平与增长

表1对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总体水平及增长进行了统计描述,并以2013年为基准,根据各省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其余年份的名义收入进行调整,后续分析采用的均为调整后的实际收入。城镇家庭人均名义收入在1993~1995年增长最快,名义增长率接近58%,而实际收入增长率仅为8%,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较快,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名义收入增长率显著高于实际增长率。随后经济增长放缓,物价下降并一度进入轻微的通货紧缩阶段,2000~2002年名义收入增长率与实际收入增长率非常接近,均略高于20%。1993~2002年城镇家庭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不到1倍,但2002~2013年,实际收入水平已翻了一番。2002年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极大促进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2007年物价上涨有所增快,但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经济增长放缓,物价回调,2007~2009年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仍然高于实际增长率。2013年中国城镇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25824元,2011~2013年的收入增长率较2007~2009年有了明显提高。

三、收入流动性的变化

(一) 测度方法

在收入流动性的描述研究中,转换矩阵的应用非常普遍。在收入转换矩阵中,元素 p_{ij} 表

表1 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整体水平及增长

	年 份							
	1993	1995	2000	2002	2007	2009	2011	2013
名义收入								
均值(元)	2892.2	4561.3	6494.5	7901.2	18628.3	21490.5	20618.0	25823.9
增长率(%)		57.7		21.7		15.4		25.2
中位数(元)	2500.0	3964.3	5553.8	6705.3	15000.0	17522.0	16666.7	21266.7
标准差	1779.3	2770.1	4368.2	5252.1	17616.6	18775.2	17027.6	20765.6
实际收入(2013年价格)								
均值(元)	6271.1	6787.2	8750.5	10719.8	22230.8	24580.2	21753.7	25823.9
增长率(%)		8.2		22.5		10.6		18.7
中位数(元)	5528.7	5911.3	7544.5	9223.8	17918.1	20018.1	17595.9	21266.7
标准差	3639.0	4002.2	5702.2	6935.2	21067.4	21474.5	17982.0	20765.6

注:增长率是相对于前一个时间点而言的;作者根据CHIP数据计算得到。

1995年CHIP城镇实际总样本包括6931个家庭,2002年为6835个家庭,2007、2008和2009年CHIP城镇住户调查的实际总样本分别为5004户、5000户和4800户,2013年为6674个家庭。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未列出。

示初期处于第 i 收入组的人,末期位于第 j 收入组的概率。一般根据样本估算,将收入由低到高划分为 n 等分组,标出每个样本在初期和末期所处的位置,计算出初期每一收入组人数中,在末期位于各收入组的人数比重,从而得到收入转换矩阵。根据定义, $\sum_{j=1}^n p_{ij}=1$ 。

基于收入转换矩阵,Shorrocks(1978b)提出了矩阵迹指数:

$$M(P)=[n-\text{trace}(P)]/(n-1) \quad (1)$$

其中 n 为分组数, $\text{trace}(P)$ 代表收入转换矩阵 P 的迹,即转换矩阵对角线元素之和。除了关注转换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Atkinson等(1991)提出流动性指数还考虑与对角线相邻的元素,度量位置相对稳定人群所占比重,即收入位置维持不变或移动一层的比例为:

$$\frac{1}{n} \sum_{i=1}^n \sum_{j=i-1}^{i+1} p_{ij} \quad (2)$$

这一指数侧重的是不流动性的衡量,为了充分考虑其他远离对角线的元素,Atkinson等(1991)还提出了平均移动率,以移动的幅度为权重对移动概率进行加权平均:

$$\text{Average Jump}=\frac{1}{n} \sum_{i=1}^n \sum_{j=i-1}^{i+1} |j-i| \times p_{ij} \quad (3)$$

式(1)至式(3)表明,矩阵迹指数和平均移动率的数值越大,度量的收入流动性越高。

(二) 测度结果

表2至表5是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分别在4个阶段的五等分组收入转换矩阵。数字1~5分别代表家庭人均收入最低20%、次低20%、中间20%、次高20%和最高20%的分组。

以五等分组转换矩阵为例,矩阵迹指数从1993~1995年的0.704下降到2000~2002年的0.494,2007~2009年回升到0.666,2011~2013年又下降到0.381;平均移动率则相应地从0.754下降到0.480,随后提高到0.761,之后又下降到0.347。十等分组的流动性指数大于五等分组,但变化趋势一致。依据收入转换矩阵和流动性指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在1993~1995年达到最高水平,2011~2013年降为最低水平。这意味收入流动性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也意味着不同收入阶层的固化度在上升。

表2 1993~1995年收入转换矩阵

1993年	1995年				
	1	2	3	4	5
1	0.57	0.23	0.12	0.05	0.03
2	0.32	0.31	0.21	0.12	0.04
3	0.09	0.31	0.30	0.21	0.09
4	0.02	0.13	0.29	0.36	0.20
5	0.00	0.01	0.08	0.26	0.64

注:五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704,平均移动率为0.754;十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819,平均移动率为1.550。

20世纪90年代前期城镇居民较高的收入流动性,是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出现的全面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分不开的。在出现大量“发财致富”机会的情况下,大批人群“下海”经商,这往往是那些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的人群,没有“铁饭碗”的劳动力首当其冲,一部分人抓住了机会,翻身成为高收入者。

第二,2000~2002年和2011~2013

年是收入流动性下降的两个时期,但二者具有不同的特点。2000~2002年收入流动性减弱,表现为不流动的比例明显增大,同时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的比例有所减小。这可能与当时企业改制、减员增效所带来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有关。大批的下岗失业工人沦为城镇低收入阶层,并且其收入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在低水平上。2011~2013年的收入流动性再次减弱,甚至低于2000~2002年,主要表现为收入不流动的家庭比例显著提高,几乎没有高收入家庭流动到中低收入组。这意味着高收入家庭的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其财富的积累足以使其高收入水平保持长期稳定。

第三,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在2007~2009年有所回升,表现为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和高收入群体向下流动的比例均有所增加,这与在此期间出现国际金融危机有关。一方面金融危机冲击着一些外资部门和高薪产业(如证券业、房地产业),导致这些部门工资收入的下降或缓慢增长,另一方面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维持了就业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上升。

表3 2000~2002年收入转换矩阵

2000年	2002年				
	1	2	3	4	5
1	0.72	0.21	0.04	0.02	0.01
2	0.23	0.51	0.18	0.06	0.02
3	0.04	0.23	0.50	0.19	0.04
4	0.01	0.04	0.25	0.54	0.17
5	0.01	0.01	0.03	0.20	0.76

注:五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494,平均移动率为0.480;十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676,平均移动率为1.004。

表4 2007~2009年收入转换矩阵

2007年	2009年				
	1	2	3	4	5
1	0.57	0.26	0.11	0.04	0.02
2	0.22	0.36	0.28	0.10	0.03
3	0.09	0.20	0.36	0.27	0.08
4	0.08	0.12	0.18	0.39	0.23
5	0.03	0.06	0.06	0.20	0.65

注:五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666,平均移动率为0.761;十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779,平均移动率为1.569。

表5 2011~2013年收入转换矩阵

2011年	2013年				
	1	2	3	4	5
1	0.80	0.13	0.04	0.01	0.02
2	0.18	0.63	0.15	0.03	0.00
3	0.01	0.24	0.59	0.14	0.03
4	0.00	0.01	0.26	0.62	0.12
5	0.00	0.00	0.00	0.16	0.84

注:五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381,平均移动率为0.347;十等分组矩阵迹指数为0.567,平均移动率为0.718。

四、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

家庭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向上还是向下流动,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个人和家庭的特征因素,也包括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特征和供求关系。本文利用多元选择(Mlogit)模型,从家庭收入特征、劳动力就业特征、人口结构特征、户主特征及所在省份特征来分析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并考察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一) 收入流动方向的定义

为了定义收入流动方向,本文借鉴 Albornoz 等(2007)衡量相对流动的方法:在两个时期内,如果某个家庭人均收入的绝对变动大于0,且该家庭人均收入的变动大于所有家庭收入变动的均值,同时该家庭收入在收入排序(依次从低到高)中,后期的位置高于前期,则该家庭被定义为相对向上流动,具体表示为:

$$\Delta Y_i > 0 \text{ 且 } \Delta Y_i > \frac{1}{n} \sum_{i=1}^n \Delta Y_i \text{ 且 } rank_{i,2} > rank_{i,1}$$

如果某个家庭人均收入的变动小于0,且该家庭人均收入的绝对变动小于所有家庭收入变动的均值,同时该家庭收入在收入排序(依次从低到高)中,后期的位置低于前期,则该家庭被定义为相对向下流动,具体表示为:

$$\Delta Y_i < 0 \text{ 且 } \Delta Y_i < \frac{1}{n} \sum_{i=1}^n \Delta Y_i \text{ 且 } rank_{i,2} < rank_{i,1}$$

此外的其他情况定义为相对不流动。

表6描述了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流动方向的分类情况。在1993~1995年相对向上流动家庭的占全部样本的42.4%,不流动的占11.8%,向下流动的占45.8%。到2000~2002年,不流动的比例提高到49.3%,而相对向上或向下流动的比例则分别下降到33.4%、17.3%。2007~2009年,相对不流动的比例下降到18.3%,而向上流动的比例为48.5%,向下流动的比例为33.2%。2011~2013年,相对不流动的比例显著上升到55.4%,相对向上或向下的比例分别为30%、14.6%。

(二) 变量描述统计

表7描述的是城镇家庭的收入结构特征、劳动力就业特征、人口结构特征和户主特征的变化。不同于2007~2009年的追踪数据,1995、2002和2013年CHIP调查中的回忆数据只有收入信息,因此,本文选取的家庭特征变量分别是1995、2002、2009和2013年的信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了收入水平提高外,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使收入的构成发生变化,根据CHIP数据的计算,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从1995年的75%下降到2002

表6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流动方向的分类情况 %

	时间段(年)			
	1993~1995	2000~2002	2007~2009	2011~2013
相对向上流动	42.4	33.4	48.5	30.0
相对不流动	11.8	49.3	18.3	55.4
相对向下流动	45.8	17.3	33.2	14.6

年的71%,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64%,2013年的不到60%。本文用家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来代表家庭收入特征。

家庭的收入来源于家庭成员的劳动就业,因此劳动

由于1995、2002和2013年的数据中相关的家庭特征只是1年的截面信息,本文无法分析这些特征变化的影响。在2007~2009年的分析中,本文也采用2007年的特征信息进行回归,试图考察家庭特征改变可能造成的影响,但结果无明显差异。

力就业特征会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及变动。随着城镇经济改革,居民就业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5年城镇家庭就业人员中,在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高达73%,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和私营企业的发展,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0%,2009年进一步降低为18%,2013年再次下降到14%。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则从1995年的40%下降到2002年的30%,2009年为23%,2013年为22%。1995年6.5%的家庭有失业人员,由于下岗职工的大量出现,2002年接近16%,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政府扩大就业政策的实施,200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0%,2013年减少到7%。本文用家庭劳动力国有企业就业的比例、第二产业就业的比例,以及是否有失业人员来代表劳动力就业特征。

同时家庭人均收入与人口结构特征密切相关,家庭规模是影响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整体上,三口之家是中国城镇地区主要的家庭结构。从年龄构成来看,城镇家庭结构的变化非常显著。1995年接近58%的家庭有16岁以下的儿童,2002年下降到47%,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40%;

表7 城镇居民相关家庭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年 份			
	1995	2002	2009	2013
收入特征				
工资性收入比重(%)	75.35 (31.54)	71.43 (33.19)	64.27 (37.19)	59.92 (43.27)
劳动力就业特征				
国企就业比例(%)	72.83 (38.88)	30.26 (40.87)	18.45 (34.29)	13.97 (30.45)
第二产业就业比例(%)	40.37 (42.28)	29.52 (40.28)	22.71 (36.27)	22.33 (36.97)
失业人员数(%)				
0	93.50	84.05	89.83	93.18
1	5.77	14.26	8.65	5.80
2+	0.73	1.69	1.52	1.02
家庭人口结构特征				
人口数(%)				
1	0.25	0.35	1.03	1.93
2	11.12	13.06	15.48	18.66
3	54.84	61.21	54.60	42.78
4	23.78	16.67	14.77	17.84
5	7.51	7.24	11.36	13.66
6+	2.49	1.47	2.75	5.11
16岁以下儿童数(%)				
0	42.45	53.11	60.01	57.22
1	52.18	44.40	37.15	36.41
2+	5.36	2.49	2.83	6.37
60岁及以上老人数(%)				
0	75.61	74.37	63.19	64.34
1	14.30	13.74	15.36	14.06
2+	10.09	11.89	21.44	21.61
户主特征				
男性(%)	66.61	67.97	67.40	74.99
年龄(岁)	45.92 (11.20)	47.70 (11.06)	51.62 (12.72)	50.57 (12.5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0.23	7.53	9.61	11.90
初中	30.50	28.98	24.30	30.86
高中	19.82	24.88	27.23	19.55
中专	16.20	11.99	9.67	9.63
大专	14.48	18.05	16.51	14.42
本科及以上学历	8.77	8.57	12.68	13.64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2013年约为43%,且有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比重提高到6.4%。城镇家庭少子化的趋势有所缓和,但人口老龄化趋势仍然非常明显。1995年不到25%的家庭有60岁及以上的老人,2002年这一比例超过了25%,2009年达到37%,2013年为36%。本文用家庭人口数、是否有16岁以下的儿童、是否有60岁及以上的老人来表示家庭人口结构特征。

在户主的特征方面,本文用户主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来代表家庭的人口学和人力资本特征。前三轮数据中,大约2/3的城镇家庭户主为男性,2013年男性户主的比例提高到75%。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强,户主的平均年龄也随之增长,1995年为46岁,2002年接近48岁,2009年接近52岁,2013年约为51岁。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1995年有30.5%的城镇家庭户主为初中学历,高中学历接近2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不到24%;2002年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比重明显降低,高中学历接近25%,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已经超过了26%;2009年高校扩招的影响已经显现,高中学历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7%,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从之前的不到9%,提高到13%。2013年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提高到14%。

此外,省份特征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的占比。

(三) 影响因素分析

Mlogit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基准组为相对不流动。表8显示,城镇家庭初期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相对向下流动,越不利于向上流动。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依次下降,1993~1995年最大,2011~2013年最小,也说明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整体上是逐步下降的。

1. 收入特征的影响

1993~1995年,工资性收入比重的提高不利于家庭人均收入的相对向上流动;2000~2002年,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则提高向上流动概率,降低向下流动的概率,这一时期由于下岗失业的出现,作为稳定来源的工资性收入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向上流动;而到2007~2009年和2011~2013年,随着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工资性收入的作用不显著。

2. 劳动力就业特征的影响

除了在2000~2002年,家庭成员国企就业均有利于收入相对向上流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是当时城镇居民主要的就业途径,且能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有利于家庭收入的提高;90年代末国企改革导致大批下岗职工的出现,对家庭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2007年以后,改制后的大型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行业,仍然留在这些国企工作的人员有机会获得可观的收入,有助于收入的向上流动。在前两个阶段,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越高,家庭人均收入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随着城镇地区服务业的发展,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从事工业或建筑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较低,不利于家庭收

各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的占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年度数据整理计算得到。

表 8 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流动方向的影响因素

变 量	1993~1995 年		2000~2002 年		2007~2009 年		2011~2013 年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初期收入(千元)	-0.150*** (0.010)	0.151*** (0.009)	-0.032*** (0.004)	0.063*** (0.004)	-0.016*** (0.003)	0.034*** (0.003)	-0.000 (0.001)	0.025*** (0.001)
收入特征								
工资性收入比重	-0.004***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0.004***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劳动力就业特征								
国企就业比例	0.004*** (0.001)	0.000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2** (0.001)	-0.000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第二产业就业比例	-0.000 (0.001)	0.002*** (0.001)	-0.001** (0.000)	0.002*** (0.001)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有失业人员	-0.571*** (0.093)	0.152* (0.089)	-0.360*** (0.050)	0.674*** (0.051)	-0.353*** (0.101)	0.216** (0.101)	-0.375*** (0.074)	0.012 (0.087)
家庭人口结构特征								
人口数	-0.259*** (0.030)	0.005 (0.030)	-0.228*** (0.024)	0.072*** (0.028)	-0.250*** (0.037)	0.261*** (0.038)	-0.155*** (0.019)	0.027 (0.023)
有 16 岁以下儿童	-0.188*** (0.058)	0.359*** (0.058)	-0.208*** (0.040)	-0.145*** (0.050)	-0.186** (0.077)	-0.172** (0.081)	-0.068 (0.043)	0.042 (0.055)
有 60 岁及以上老人	-0.344*** (0.071)	0.004 (0.070)	-0.145*** (0.051)	-0.248*** (0.061)	-0.189** (0.088)	-0.211** (0.093)	-0.256*** (0.048)	0.061 (0.060)
户主特征								
男性	-0.183*** (0.051)	-0.050 (0.050)	-0.094*** (0.035)	0.320*** (0.045)	-0.155** (0.066)	-0.222*** (0.070)	-0.010 (0.040)	0.049 (0.052)
年龄	0.025*** (0.003)	0.010*** (0.003)	0.006*** (0.002)	-0.026*** (0.003)	0.004 (0.004)	0.002 (0.004)	-0.002 (0.002)	-0.002 (0.002)
文化程度								
初中	0.304*** (0.087)	-0.102 (0.084)	-0.038 (0.072)	-0.212*** (0.081)	-0.213* (0.119)	-0.308** (0.123)	0.089 (0.064)	0.038 (0.078)
高中	0.401*** (0.094)	-0.157* (0.092)	0.301*** (0.074)	-0.087 (0.085)	0.112 (0.121)	-0.255** (0.127)	0.360*** (0.069)	0.170** (0.084)
中专	0.648*** (0.099)	-0.015 (0.096)	0.567*** (0.080)	-0.269*** (0.096)	-0.042 (0.139)	-0.523*** (0.148)	0.166** (0.079)	-0.233** (0.104)
大专	0.742*** (0.106)	-0.041 (0.104)	0.593*** (0.078)	-0.563*** (0.095)	0.171 (0.135)	-0.315** (0.140)	0.399*** (0.075)	0.053 (0.094)
本科及以上	0.839*** (0.117)	-0.160 (0.116)	0.903*** (0.088)	-1.027*** (0.124)	0.246* (0.142)	-0.666*** (0.150)	0.547*** (0.080)	-0.091 (0.102)
省份特征								
对数人均 GDP	0.734*** (0.072)	-0.111 (0.072)	0.310*** (0.036)	0.134*** (0.046)	0.167 (0.161)	-0.662*** (0.176)	0.480*** (0.064)	-0.125 (0.080)
劳动报酬占比	-0.003 (0.004)	-0.015*** (0.004)	-0.007** (0.003)	0.040*** (0.003)	-0.026 (0.018)	-0.033* (0.019)	-0.012** (0.006)	0.048*** (0.007)
失业率	-0.007 (0.030)	0.119*** (0.029)	0.032** (0.014)	0.022 (0.018)	0.015 (0.072)	-0.047 (0.079)	0.075** (0.033)	0.100** (0.040)
常数项	-4.241*** (0.713)	1.157 (0.711)	-2.608*** (0.419)	-3.580*** (0.534)	1.568 (2.493)	7.875*** (2.724)	-4.873*** (0.917)	-3.121*** (1.144)

注:文化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组。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p<0.1,**p<0.05,***p<0.01。

入的提高;但2011~2013年的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政府提高最低工资等政策,保障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家庭成员失业毫无疑问会提高向下流动的概率,降低向上流动的概率,且作用非常显著。

3. 家庭结构和户主特征的影响

从家庭人口结构来看,家庭人口数越多,收入相对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小,且在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会提高向下流动的概率。1993~1995年,家里有儿童或老人会降低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增加向下流动的概率;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有儿童或老人的家庭更倾向于收入的不流动;2011~2013年,有儿童的家庭影响不显著,有老人的家庭不利于向上流动。1993~1995年,男性户主的家庭不利于收入向上流动,2000~2002年,男性户主还会提高家庭收入向下流动的概率,2007~2009年,男性户主的家庭趋于不流动;2011~2013年,户主性别的影响不显著。户主的年龄越高,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但到2007~2009年和2011~2013年,户主年龄的作用不显著。从整体上看,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家庭人均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且教育的作用一直较为显著。

4. 省份特征的影响

在控制的省份变量中,人均生产总值高的地区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向上流动,而劳动者报酬比重和失业率在不同阶段的影响并不一致。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1995、2002、2007~2009年和2013年CHIP数据,实证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水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水平基本上表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7~2009年收入流动性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是短暂的,很快被后一个时期的收入流动性下降所取代。(2)1993~2013年,城镇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变化主要来自于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而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一直持续存在。(3)从影响因素看,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家庭的收入特征、劳动力就业特征、人口结构特征、户主特征和所在省份特征对收入流动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城镇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工资性收入比重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劳动力就业随着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不同时期对家庭收入流动产生不同影响,失业会导致家庭收入的相对向下流动。家庭规模越大,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小;随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加强,有老人的家庭不利于收入的向上流动;而教育对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作用一直较为显著。(4)提高社会成员的收入流动性,不能忽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作用。相对公平和自由竞争的环境有助于提高收入流动性;反之,在权力和垄断因素过于突出的情况下,收入流动性受到制约,将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完善要素价格机制,打破垄断,形成公平合理且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促进收入流动、完善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促进就业,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并且强化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收入再分配功能是增进收入流动、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当然,本研究尚存在局限性。首先,收入流动性的衡量是一个多维概念,本文采用的是收入转换矩阵的流动性度量,没有利用多种测度方法进行讨论。其次,在流动性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一些人力特征指标如健康、培训等也会影响收入流动,但囿于数据信息的限制,本文无法考虑。我们拟在后续研究中,收集更为详尽的数据资料,利用多种测度方法进行全方位分析,以期得到更为稳健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罗楚亮(2009):《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性研究》,《财经科学》,第1期。
2. 孙文凯等(2007):《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经济研究》,第8期。
3. 王朝明、胡棋智(2008):《中国收入流动性实证研究——基于多种指标测度》,《管理世界》,第10期。
4. 王洪亮等(2012):《中国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否公平:基于收入流动性的微观计量》,《世界经济》,第1期。
5. 严斌剑等(2014):《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经济学(季刊)》,第3期。
6. 杨穗(2016):《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与不平等》,《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7. 尹恒等(2006):《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研究》,《经济研究》,第10期。
8. 臧微、白雪梅(2015):《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区域结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9. 章奇等(2007):《收入流动性和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1期。
10. 周兴、王芳(2010):《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管理世界》,第5期。
11. Albornoz F., Menéndez M.(2007), Income Dynamics in Argentina during the 1990's: 'Mobiles' did Change over Time. *Económica*. Vol. LIII (1-2): 21-52.
12. Atkinson A.B., Bourguignon F., Morrisson C.(1991) *Empirical Studies of Earnings Mobility*. London: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3. Fields G.S.(2010), Does Income Mobility Equalize Longer-term Incomes? New Measures of an Old Concept.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8(4): 409-427.
14. Friedman M.(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5. Khor N., Pencavel J.(2006), Incom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4(3): 417-458.
16. Khor N., Pencavel J.(2010), Evolution of Income Mobilit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1-2002. In Zhuang J.(eds.) *Poverty Inequality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Asia: Measurement, Policy Issues and Country 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Anthem Press.
17. Krugman P.(1992), The Rich, the Right, and the Facts: Deconstruc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Debate. *The American Prospect*. 3(11): 19-31.
18. Shi X., Liu X., Nuetah A., Xin X.(2010),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18(2): 41-59.
19. Shorrocks A.(1978a),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om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2): 376-393.
20. Shorrocks A.(1978b), The Measurement of Mobility. *Econometrica*. 46(5): 1013-1023.

(责任编辑:朱萍)

ical spatial spillover,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regional poverty. Furthermore, the paper uses spati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spatial panel econometric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dowment conditions and geographical spillovers effect on regional poverty, based on the 30 counties' dates of Long men Mountain Fault Zone from 2008 to 2013.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risk of natural disasters or the more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higher the poverty rate is. It leads to a high degree of spatial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which causes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poverty in the region. Meanwhile, the role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is presenting "alienation" condi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se areas show weak effect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Mean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conditions on poverty reduc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roles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are evid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the special focus on contiguous poor areas, it is fundamental to increase public service supply efforts and enhance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alysis on Living Arrangement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the First-generation of Only-child

Families in Urban Areas

Wang Yuesheng ·49·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first-generation of only-child family survey in 5 provinc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living arrangement, its influence factors and varying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the first-generation of only-child families in the urban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an only child gets married, the main living arrangement is core household with parents and the child. After an only child gets married, two arrangements of living in nuclear families and living in lineal families co-exist for the parents and their child. The sex of married child, types of marriage, number of house owned by parents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child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ir living arrangements. These are resulted from mutual restriction of traditional habits and modern concept, living desire and material condition, personal preferences and family functions. The differenc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ld's first marriage, the first birth and the raising child shows that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 family members is not following any single or one-way pattern evolution. It indicates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Compared with multi-children families, the boundary of living units between parents and only-one child is relatively unclea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modes are obvious.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y-child Family's Living Arrangement

Wu Haixia Wang Guangzhou ·66·

Using 2005 one percent national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of 2 per thousand data, on the basis of mother and child matching of original dat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only-child family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from the view of mother and chil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iving arrangement of only-child family and multi-child famil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urban and rural, mother and child's age, and migration status. The ratio of only-child mother living with her child in urban area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living in rural areas. The ratio of only-child mothers who are older than 54 years old living with child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ose mothers with two or more children at the same age, and these living in urban areas are higher than those living in rural areas. Children at 0 to 14 years old and unmarried adults constitute the main body of those living with paren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ratio that mother living with only-child is above 50%. Among the rural and urban families that mothers live with their only-child, the proportion of mothers not leaving her registered residence is the highest. The proportion of mothers migrating to cities with her child is ranked second. The proportion that elderly mothers follow her only-child to live in cities is less than 5%. Only-child parents who move and live to their child's city do not bring significant pressure for providing for the aged to cities either. The regional planning for aged is still needed to focus o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the elderly.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Yang Sui Li Shi ·78·

Based on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 1995, 2002, 2007-2009 and 2013 urban dat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hanges of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since 1990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was declining as a whole, though it increased temporarily from 2007 to 2009 affec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From 1993 to 2013, the level of income mobility mainly depended on the mobility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families. The immobility of high-income families existed continu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long with the adjustment of ownership and industry structure, the labour force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Both the changes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play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effects on income mobility. Therefore, providing a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cultivating the equitabl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distributive func-

tion are the effective means to facilitate income mobility and narrow income gaps.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An Analysis Based on Industrial Dynamic Panel Data

LI Shanshan · 90 ·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not onl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but also has an indirect impact through affecting market-orien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export-oriented FDI, vertical specialisation and other factor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4 industrial sectors in China, the paper uses system-GMM empirical method to analyz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is not in confli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all industries and the low pollution industries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and there exists inverted-"U" shaped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in high pollution industries, in other words,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irst promotes then preven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high pollution industries could weake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export-oriented FDI on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and inhibi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market-oriented FDI. Howev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eem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skills through vertical specialisat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practically increa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guarantee market returns of companies with clea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and improve the scale and level of market-oriented FDI. Meanwhil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sectors.

The Impact of Labour Relations on Intention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wns for Migrant Workers: A Study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of 151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n Qingchi Chen Xinmin · 101 ·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received from 1 460 migrant workers of 151 enterprises in Shunde District, Foshan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labour relations on migrant workers' intention of get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s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wns by using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ith contingency table analysis with factors regarding person, family and region being controll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intentions of get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towns is maintained at a low level. Even though the difference of proportion of this intention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 exist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tentions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ork autonom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sample of the whole and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to the sampl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satisfaction of labour relationship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in the sample of the whole, the new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addition, there also exist different factors related with person, family and region among the sample of the whole, the new a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ang Fuqin · 110 ·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Work and Life Surve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hich is consisted of a sample data of 1 766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702 old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of migrant workers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local or non-local urban workers. Although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s in terms of the sense of justice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is rather different. Overall,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variables, such as education and income, are lower than the local comparative variables, such as subjective status, concerning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influences of education and subjective status are more significant 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income is stronger on the old generation. Meanwhile,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from the local urban population are more emphasised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judging social justice, while the old generation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material gain from their day-to-day work. Besides,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lso differs among the migrant workers working at municipalities,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Therefor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should improve human capital of migrant workers, sustain and increase their income level, and implement a series of localised measures to achieve equalis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urban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